

走出“疑古時代”

李學勤

【編者按】本文是李學勤先生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講演，着重談到了現代考古發現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意義，講演者尤其痛感“疑古”思潮在當今學術史研究中產生的負面作用，於是以大量例證指出，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相當多古籍記載不可輕易否定，我們應從“疑古”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，真正進入“釋古”時代。

一 話題：考古與思想文化研究

談到近年來的考古發現，特別是一些新的考古發現，它們對研究古代歷史、文化，特別是在座各位關心的思想文化會有什麼影響，這個題目，還是很值得研究的。考古發現對研究歷史作用很大。這一點，恐怕現在所有的人都承認。這點恐怕是一個常識。不過，很少有人想到它對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。大家都重視的不够。關於它有這種作用，很多人不這麼看。爲什麼？我想這裏有個原因，就是早期的考古學本來就不強調思想文化的研究。特別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裏，英國的柴爾德，就是Gordon Childe，他給我們帶來一種影響。大家知道，柴爾德這個人在一定意義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。比如從他的書，像《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》等等，我們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。但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，他帶來了早期考古學上的丹麥學派的影響。因爲丹麥學派本來是搞博物館，它的創始人，就是發明“石器時代”、“銅器時代”、“鐵器時代”這些詞的。他們都是搞博物館的，光擺東西，不大講，當時也不可能講思想文化。所以，柴爾德的書也帶來了一些這樣的影響。我們大家都知道，在蘇聯，很長一個時期裏，他們的考古研究所不叫“考古研究所”，他們不用“考古學”這個詞，是

叫“物質文化研究所”。什麼叫“物質文化”？這個詞不大清楚。因爲考古發現的東西是不能用“物質文化”來限定的。考古挖出來的東西，怎麼都是“物質文化”呢？我自己從來都不這麼看。所以，我寫那本《東周與秦代文明》的小冊子，裏面就特別講到一段話。後來好多人都引用這段話，幸虧大家覺得還可以。那意思就是說，考古學發現的東西，當然是物質的，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。其實道理很簡單，比如一個墓葬，它總有一定的葬儀，一定的禮制，這些東西都是精神的東西。一個銅器、一個陶器，這些東西都是反映當時的社會，當時的風俗習慣。如果你只是從物質上看，那麼，這樣的考古學，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慮了。這是我的一種看法，向大家請教。那麼，今天我就想講講考古文化對於精神的東西有什麼影響。

二 兩種考古證據

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把考古學的東西和歷史學的東西放在一起來研究，特別是把地下的東西和地上的傳世文獻放在一起來研究，從方法上講，是我們大家尊重的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。王國維先生提出來二重證據法，即地下的與地上的相互印證，這是很著名的。它爲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。

王靜安先生是講“二重證據法”，最近聽說

有學者寫了文章，提出“三重證據法”，把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。這第三重證據就是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。如果說一般的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可以分開，那麼後者就是第三重證據。像楚簡就是第三類。考古學的發現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有字的，一種是沒字的。有字的這一類，它所負載的信息當然就更豐富。有字的東西和挖出來的一般東西不太相同，當然也就可以作為另外的一類。

我是不是先用比較簡單的話說說那些沒有字的東西？沒有字的東西，在我看來，對於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，甚至於對古書的研究也很有用。最近我很推薦考古所張長壽先生寫的一篇文章，在《文物》今年第4期發表，題目叫《“牆柳”與“荒帷”》。特別是裏面講了銅魚，這見於禮書的鄭玄注，用考古材料一講就清楚了。類似這樣的研究，今天不可能多談。考古發現的東西，或者遺址，或者墓葬，或者建築，或者服飾，或者各種器物的形製，都可以印證古書。而印證古書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書的真偽。像墓葬中這些銅魚，作為棺蓋上的裝飾，一串串的，現在我們知道，這些東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時期的。最近在三門峽的虢國墓地發現這種銅魚很多。墓打開一看，張長壽先生在那兒說，這和我們在禮西挖的東西一樣。我們挖的墓大多是盜過的，這兒是完整的。這樣一些材料，可以印證古書的一些講法。那我們大家就可以知道《儀禮》這本書確實是講春秋的，至少是有相當一部分是和春秋時代有關。

這些都是沒有文字的東西。我想這些是比較直接的。還有一些是比較間接的。既然是間接的，那就不一定很準確了。但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體會的。比如說前一個時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。那種琮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：你從側面看是一個玉琮，但從上面看就是一個玉璧，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。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禮天的，琮是禮地的，這個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結合起來的。當然這一點僅僅是推論，不能直接證明一定是對的，可是至少還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討論良渚文化的朋友有這樣的看法，我個人也有這樣的想法。當然這些是間接的，不像我們剛才說到的銅魚，是可以直接看到的。這類情形，我們還可舉很多例子。它不僅可以證明我們對很多問題研究的不够，而且還可以證明很多古人本來講的是對的東西，後人卻懷疑起來了，結果

最後證明，他們的看法還是對的。

有一個例子可能不恰當，聶崇義的《三禮圖》，它的內容很多可能是從漢代和六朝的一些圖傳下來的。它把犧尊每每畫成一種動物形狀，背上揜着個尊。宋仿的銅器很多是這個樣子。後來人就說這種東西是杜撰，犧尊不是這樣，沒有動物身上揜個尊的。現在像這樣的東西出了好幾件，最近文物精華展上看到的一件，完全是這個樣子，可見《三禮圖》雖然畫的不一定都對，但是並非毫無所據。所以，我們對古代的東西別那麼輕易懷疑。當然，今天更重要的東西還是帶文字的東西。帶文字的考古發現，即第三重證據，是更重要的，它的影響當然特別大。王靜安先生講近代以來有幾次大的發現，都是帶文字的材料。20年代，他寫了《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》，你們知道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哪兒嗎？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這篇文章是發表在《科學》雜誌上。《科學》雜誌是盧于道主編的，他和秉志、胡先驥等是當時的留美學生，這些人回來後成立了一個中國科學社，出版了《科學》、《科學畫報》，後者由盧于道和他的夫人盧邵靜容主編。說起這兩個人，我總是帶着敬佩之情。雖然今天我是學了文史，可原來是想學科學的，我有一點科學知識，都是從他們的這兩種雜誌來的。王靜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《科學》雜誌上，我過去曾經有過一本，現在是珍本了。

王靜安先生說，中國歷代發現的新學問都是由於有新的發現。他舉的例子很多，最重要的是漢代的孔壁中經和西晉的汲冢竹書，都是地地道道的古書。這些古書發現之後，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，這種作用到今天還能看到。我們今天的新發現至少不比那個時候少吧？可是有一點，重要性差些，比如我們還沒有發現《尚書》。張政烺先生總是說什麼時候挖出《尚書》就好了。

現在的發現還沒有《尚書》，可是至少從數量上說，比起古代一點不差，因此它的影響是特別大的。從70年代以來，屢屢有一些新的東西發現，這些發現使我們直接看到當時的書。我自己認為，對這些東西做全面和徹底的研究，恐怕不是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做得到的。因為比如汲冢竹書，一直到清朝還有人研究，對古史研究作用很大。所以這一類新發現，它的影響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看到。

對考古學的作用，我發表過一個謬論。古代的東西無論在空間還是時間上與我們都有一段距離。

這個距離，必須通過信息才可以越過。古代給我們的信息就是古書，除了這個沒有第二條路。可是考古學的東西不是這樣，那是另外一條途徑。古書是歷代傳下來的東西，它是會被歪曲和變化的。不管有意無意，總會有些歪曲，而考古獲得的東西就不一樣，我們是直接看見了古代的遺存。現在我們有了機會，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古書，這就沒有辨偽的問題。

古書的面貌和我們的想像是大不一樣的，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。有時候我常常說，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感受去體會孔安國，或者東皙、荀勗這些人的重大成果。孔安國作隸古定，那時候他對戰國文字畢竟不大懂，所以弄出很多問題來。當然他在某些點上比我們認識得更多，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，就像今天我們很多人已不認識繁體字。繁體字離開我們才多少年？社會上繁體字還存在。可當時社會上已沒有古文流行，人們沒有這種教養。

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古書是一種新的信息途徑。它使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當時人的思想、學術，這個機會是前人沒有的，因為至少兩千年來很少有這樣的機會。過去很多東西都糟蹋了，像王僧虔所見的所謂蝌蚪文《考工記》，結果根本沒有傳下來。還有傳奕本的《老子》提到，在徐州發現了項羽妾墓，墓裏面發現了《老子》，可是沒有人把它記下來，只是做了一點兒校勘，也不知道哪些是從項羽妾墓來的，是不是就是《汗簡》裏的《古老子》？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發現的這些書整理出來，把這些信息記錄下來，發表出來。至於說，我們學術界要想充分吸取這些東西，得到它的影響，那還僅僅是嘗試。當然，今天它已經起了很大作用。

我們發現的這些東西，在現已發現的這類材料裏，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種就是秦律和漢律。過去研究漢律，比如沈家本、程樹德專門輯錄漢律，他們鈎稽漢律費了那麼大勁，至於秦律簡直不成條，所以程氏的書只叫《九朝律考》，不敢叫《十朝律考》。近年我們居然在雲夢睡虎地和龍崗兩次發現了秦律。秦律我們發表得還比較快。現在江陵張家山兩批漢律竹簡還沒有發表，但可以告訴你們，材料好極了。我老勸人不要急於去討論什麼“隸臣妾”，最好稍微等一下。因為我們的材料太多了，如果你說錯了的話，馬上沒法辦。張家山簡數量很大，第一批和雲夢睡虎地的簡差不多，總在1200枚左右。睡虎地隨葬秦律的那個叫喜的人是個令史，他抄的

那些律，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沒有。隨葬張家山第一批漢律的那個人我們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，但他的官職比睡虎地的官要高，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。這批簡給我最深的印象是《盜》、《賊》二律，它的細緻程度比起唐律並不遜色。它考慮的各種細節，比如殺人吧，涉及各種不同的情況，各種不同的對象，以及親屬的關係等等，非常非常細。從這一點看，從漢朝到唐朝的發展不是很多。

另一個大家最關心的是馬王堆帛書的《周易》，特別是《易傳》。關於《易傳》，我可以告訴大家，這個《易傳》中的《繫辭》比今本多出很大的一段，而這一段和今本《繫辭》有同樣的哲學意義，這當然極其不得了。

當然除這些，還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發現，比如定縣八角廊的西漢竹簡《論語》，估計還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。另外還有《周易》，那是阜陽八角廊漢墓出的，是占卦用的，像《火珠林》這類玩意兒。

那麼現在問題是我們發現這麼多東西，現在看起來絕大多數是佚書，即使是今天還有傳本的，也很不一樣。比如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怎麼會把《德經》放到《道經》前面？這個問題需要討論。台灣一些學者的那個意見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，就是抄寫時把上下篇給拿錯了。當時是抄寫上的錯誤，造成了一種暫時流行的本子。這我自己是不接受，但還是可以考慮。

三 古代學術史的再認識

以上所說，引起種種的問題。我認為，今天它對我們學術史研究的影響還不僅僅是這些發現的東西本身。我們看見《周易》經傳這些東西，當然對研究《周易》有很大好處。我們看到《老子》，對研究老子很有用；看到《孫子》，對研究孫子很有用。但我以為更重要的一點，是這些出土的東西所顯示的當時的學術面貌。這種面貌和我們過去的估計相當不一樣，這件事是個大問題。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，就是我們今天的學術史研究有一個改觀的必要。

當然如何評價這個影響，今天我們還做不到。雖然我比在座的幾位癡長幾歲，但就連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結果。因為發現太多了，不斷出現，必須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，才能看到其成果。可是

有一點今天我們已經可以說的，就是學術史恐怕得重寫，還不僅是先秦和秦漢學術史的問題，而是整個學術史的問題。在這一點上它是特別重要。今天已經可以認識到，過去我們的一些結論，受過去出現的思潮影響而認識到的學術史的面貌，現在看起來與事實有相當大的距離。

我說的思潮是什麼呢？就是大家都深受影響的疑古思潮，下面我說說這方面的一些看法。

你們大概都看過我在《人文雜誌》增刊上的一篇文章。這裏我得做點兒說明，從小我就讀過《古史辨》。小時候我有一次走到舊書攤上，買到一本《古史辨》第三冊的上本，看過之後就着迷了，後來把整個《古史辨》都買來看。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進步的，從思想來說是衝決網羅，有很大進步意義，是要肯定的。因為它把當時古史上的偶像一腳全都踢翻了，經書也沒有權威性了，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，當然很好。可是它也有副作用，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，它對古書搞了很多“冤假錯案”。

從晚清而起的這股思潮不只是中國有，外國也存在，如日本的白鳥庫吉，他不是寫過《堯舜禹抹殺論》嗎？在日本也成了名文。奇怪的是這篇東西在中國怎麼沒見過？我覺得現在應該翻譯翻譯了。西方如馬伯樂，他寫的東西也是這個作風，而且也是比較早的。晚清以來的看法為什麼在中國會造成這種影響，還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學術史。

我一直認為清儒的學術是做出了巨大成績的，可是，它有一個極不好的地方，在今天還有影響，就是它很講門戶。當然這一點，實際上晚明也有。晚明就有人開始講門戶，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學者還是很博大。所謂“三大家”，甚至於像“四公子”這些人，不管他學什麼，都是很博大。甚至一些較小的思想家，像江西的易堂九子，都很博大，還沒有門戶之見。但清朝自己的學術確立之後，特別講門戶，一點點講，第一步是分漢、宋，首先就把宋學一腳給踢出去了。最初宋學的影響還是很大，像李光地這些人還是大受重視。可是後來漢學逐漸上升，漢、宋的門戶就先分開來了。江藩的《漢學師承記》就是證據。分了漢宋之後，再分西漢、東漢，把今、古文分開了。然後在今、古文裏還要分，越分越小，眼界越來越狹窄，看的書越來越少。這個分門戶的辦法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辨偽。這個講門戶實在要不得。我覺得我們寫學術史，一定不要這

樣。

有一點要指出的，就是在對古書的辨偽上，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繼承宋學。宋人是開始辨偽的，在這一點上，它是完全繼承了。宋明理學的一個特點，就是講究直接讀古書，不依靠漢唐注疏，這當然是好事。我常常說，他們對早期儒家的一些認識，在某些點上可能比漢代人認識的還正確些，因為他們直接讀古書，不考慮後來的師說，可能有些地方是值得考慮的。不過這種傾向發展到末流，就變成了師心自用，特別是明朝一些人，簡直是束書不觀了。清人改變了這種風氣，但門戶之見在帶來的副作用中是很重要的一點。

四 古書新證（甲骨文）

我覺得我們今天研究古代文獻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還是真偽與年代。在這方面，有兩本書可以作為標誌，一本就是50年代張心激的那部《偽書通考》，各個圖書館都有這本書。（李零：國外漢學家也是必讀此書。他們要用哪本書，總要先翻翻此書！）張心激的書前面有一部分是講方法論，學了多少條，代表他的辨偽方法。其影響之大，你別看余嘉錫先生那本書，也比不了。余先生的書，即《古書通例》，是上海出的。其實《古書通例》比張心激寫得好的多。第二部書就是鄭良樹的《續偽書通考》，不知大家看過沒有？他也有講方法論的部分，對比一下就知道，時代已經變了。做《續偽書通考》的這位鄭良樹先生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，原來作過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主任，是台大的早期畢業生。你看《續偽書通考》就可以知道，近二、三十年來，關於辨偽方面的認識已有很大的變化，這是很明顯的。這裏起很大作用的就是考古發現。這可以說明現在的學術界對疑古思潮既有所肯定，也有所揚棄。這點是對的，特別是我們從新發現來看，有些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。我想就古文字對文獻的關係舉幾個例子。

我們先說說簡帛書以外的。簡牘帛書以外的東西對於古書也可以印證，如甲骨文。有一點我要說明，甲骨文所能表現的東西是有限的，不能認為甲骨文沒有的東西商朝就不能有。這點是很重要的，例如有學者已經指出，甲骨卜辭的文體並非當時的唯一文體，這種說法很有意義，因為各個時代都有一些不同文體，今天仍然如此。比如報刊上的社論，

外交用的文件，和日常寫的書信絕對不能比擬。甲骨文只能刻那麼很少的一點兒字，它的文體一定是力求簡練，不能用很多虛詞。至於當時的一篇文章，就一定不同，如《商書》的一些篇和《商頌》，與商代有關係還是完全可能的。董作賓先生寫過一篇論文叫《王若曰考》，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，上刻有“王若曰：羌女……”等語。下面的“羌女”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解釋，但最好的解釋還是“羌，汝……”，這是對羌人的一種文告，意思是王這樣說：羌，你如何如何，可見當時就有“誥”這樣一種文體。這樣我們就可以證明《商書》裏的“王若曰”，還有“微子若曰”，並不是周人所擬作。

還有一個例子，現在很多人都說甲骨文裏沒有四季，我從來不這麼看。當然甲骨文到今天還沒有找到“夏”、“冬”這兩個字，可是這一點不等於說當時沒有四季的觀念。我們從常識來講，也是這樣。我這個人勞動下放去過好幾回，農業還多少幹過一點。我們知道，只要在華北這個地方住，是不可能沒有四季觀念的，這是很明顯的道理。在甲骨文裏有四方、四風，就是有四季，因為四方風的觀念就是和四季緊緊地結合在一起。那些表示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的名稱，如“析”呀、“因”呀，就是這麼來的，怎麼能沒有四季呢？其實過去于省吾先生在《甲骨文字釋林》中已經接觸到了。記四方風名的甲骨已經可以明確地證明四季的存在了。最近我還想寫一篇文章，《山海經》講四方風的地方，大家不太注意，就是它裏面總是講到“司日月之長短”。“司日月之長短”說明那個風和風來的方向是與四季有關。所以甲骨文裏的很多東西也可以論證文獻。胡厚宣先生是首先揭示四方風名的意義的，其貢獻實在很大。

金文也是這樣。金文也有局限，因為金文是鑄在銅器上，它不可能把很多東西都記錄下來，我們也不能說金文沒有的東西當時就沒有。金文與文獻印證的地方很多，比如說我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《逸周書》的《祭公》，其中有些句子和金文完全一樣，而且有些錯字也能看出來了，如金文中常見的“𩇛（音li）𩇛”，《祭公》這篇文章裏把它寫成了“執和”。這樣我們就知道，《祭公》一定是西周的作品。

還有一些銘文也是如此。前些時候我寫了一篇小文章，是講陝西出土的一件史惠鼎。那鼎不算什麼，但它寫着“日就月將”，這是出自《詩經》的《敬之》篇。《敬之》篇傳說是周成王時作的，鼎作於

西周晚期，自然可以引用。還有中山王的銅器裏引了後來收入《大戴禮記》的一段話，這段話可能出自欒武子，是春秋時期的。我們從中山王銘文還可以看出，當時中山國的人不僅學《詩》，還可能學了《左傳》，都是儒家的作品。這些是甲骨金文，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簡牘帛書。

五 古書新證（簡牘帛書）

關於簡牘帛書，我這些年有一些想法，可能對學術史的研究有一些作用。我認為最理想的是，用今天出土的這些材料設立幾個定點，然後把其他的古書排進去。過去研究古書和古書的關係，比如哪個比哪個早，我們也可以有一些推定，可是年代每每沒有絕對的定點。比如假設有A、B、C三種書，A早於B，B早於C。按相對年代來說，你可以把它們放得早些，也可以放得晚些。你只要把A、B、C這三個點的順序排對了，形成一個系列，就完了，很難知道它的絕對時間在哪兒。可是今天我們的考古學材料卻可以提供中間的一些定點。只要把一個點定住了，A、B、C序列的時間就容易排定。當然這還需要很多的證據，現在也許還做不好，但至少可以先定幾個點試試。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。比如我到處做檢討的一個例子，是我關於信陽長台關楚簡的說法。1956年的時候，信陽長台關1號大墓發掘出了兩批竹簡。竹簡發表後，那個時候我年少氣盛，喜歡搶時間，馬上就寫了篇短文，登在《光明日報》上。我說竹簡中的一篇是儒家的作品，因為裏面有“先王”、“三代”和“周公”這些詞，儒家氣極濃。大家都承認我這個說法。這篇文章發表後，我就把它忘了，很長時間裏覺得沒有什麼問題。後來到了“文革”期間，中山大學幾位學者從中找出了幾句話，在古書中有，是《墨子》的一條逸文，見於《太平御覽》。過了些年，我再看這組竹簡，特別是信陽長台關的報告出來，有了更好的釋文，才發現不是原來我想的那麼回事。既然是《墨子》佚文，這怎麼還是儒家作品呢？後來查了一下就明白了，原來《墨子》裏面也有“三代”、“先王”、“周公”，這些東西，一點不少。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文章，收入徐中舒先生的紀念論文集，說明這組簡是《墨子》佚篇，其中有申徒狄與周公的對話。後來我看到李家浩寫的一篇文章，他把“周公曰”後面的字讀為“易”，說這就是“申徒狄”的“狄”字，這

就完全證明了那段話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對話。周公不是周公旦，恐怕應該是西周君，因為申徒狄是戰國時候的人。這個《墨子》佚篇的確定是很重要的。長台關這座墓屬於戰國中期，佚篇類似於《墨子》書中一般認為特別晚的那些篇，如《貴義》、《公孟》等。這些篇大都認為比較晚，肯定要比《墨子》前面學者認為是墨子自著的那些篇，如《明鬼》、《節葬》，要晚得多。大家知道，墨子的卒年已經到周安王時，即戰國中期之初了。墨子本人是到過楚國的，見過魯陽公，因此這個地方流行墨家的作品，是很自然的。這也就是說，過去我們認為《墨子》書中很晚的一些篇，其實一點兒也不晚，頂多是墨子下一代人寫的。我想這一點對於我們研究《墨子》的意義很大。還有《墨子》最後面的《城守》各篇，我們拿它跟秦簡一對照，就知道那確實是秦人的東西，所以一定是墨學傳到了秦國之後，在那個地方作的。特別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稱“王”，有的地方還是稱“公”，可見後者當時秦還沒有稱王，即在秦惠文王稱王以前，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遠。因此我們對《墨子》各篇年代的估計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。

還有一個例子，就是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。出楚帛書的那個墓葬的年代是確定的，1973年，湖南省博物館清理了那個墓葬，清理時又發現了一幅帛書。從陶器排隊等方面看，它的年代一定是在戰國中晚期之間，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。所以楚帛書的內涵在公元前300年一定有了，可不能比這個時候更晚。這也是一個很有用的定點。楚帛書是一種陰陽數術性質的書，在學術史上是很有價值的。楚帛書的內涵中有許多思想、文化的因素，既然楚帛書的年代定了，這些因素也絕不可能晚於公元前300年。從這裏出發，便能得出一系列有意義的推論，有益於學術史的探討研究。

反過來，也可以用文獻的定點來推定出土材料的時代。最好的例子是《鶡冠子》。《鶡冠子》現在在海內外都是熱門，最近我去美國，也談了《鶡冠子》，見到一些研究這部古書的學者。《鶡冠子》的年代比較清楚，它的上、下限連二十年都沒有。因為很明顯的是，龐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，書中稱呼他作“龐子”，是龐煖學生的口吻，另外有些地方還避秦始皇的諱，可見一定也經過秦代。仔細考慮，這部書的時代不出戰國的最後幾年到秦代的焚書以前。大家了解，要是不發現帛書《黃帝書》，那麼《鶡

冠子》就還是冤沉海底。《鶡冠子》從唐代柳宗元那兒就給否了，後來的人對柳宗元崇拜得很，所以很少有人肯定《鶡冠子》，以致到今天連個好的注本都沒有。從版本說，《鶡冠子》就有兩個明版，一個是明翻宋本，即《四部叢刊》影印的那個本子，還有一個就是《道藏》本。兩個本子差別不大。至於注，最早是北宋陸佃注。所謂唐寫本《鶡冠子》是假的。前不久，陳鼓應先生找我寫篇小文，我就講了《鶡冠子》的年代問題。那篇稿子寫得比較粗糙，比較倉促，希望大家多給予批評。我舉了幾個例子，可以證明是《鶡冠子》引用在馬王堆帛書中發現的《黃帝書》，《黃帝書》是早於《鶡冠子》的。特別是像“五正”這樣的詞也見於子彈庫楚帛書，更能說明它的年代。

不管怎麼說吧，我們的想法是現在出土的很多東西可以和傳世的古籍相聯繫。像《鶡冠子》，雖然沒有出土，但它和帛書《黃帝書》很像，可以說明《鶡冠子》確實是楚人作的，而且也比較早。像這些例子，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定點，可以作出很多的推論。而這些推出的結果，它的趨向是很明顯的，就是和疑古思潮相反。這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巨大的好處，就是使學術史變得豐富多了。因為過去很多書不能提，我就記不起有哪本哲學史的書提到過《鶡冠子》。這本過去所有人都不提的書，現在看來大有可談，那裏面包含着很多哲學概念，都很重要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刮目相看。

上面我說學術史一定要重新寫，其實不只是先秦的、漢代的，後來的也要重新寫。關於後者，在這裏我也要說幾句。我們每一代人，在學術上、文化上要有所發展，就一定要揚棄前人那個時代的局限，這是不可避免的。不這樣做，就不能發展。在文獻學方面，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揚棄清人的門戶之見，因為清人的缺點就在這裏。如果你不排除他們的門戶之見，一定做不出什麼新的成果。有一點我印象最深。我最早看到帛書《周易》，首先注意的就是它的次序，就是所謂卦序。它和今本到底哪個更早呢？我自己認為，帛書《周易》是很晚的，因為它完全是按陰陽說排列，做法很像京氏易，只不過比較簡單，沒有京氏易那一套系統。它實際上是分宮的，即以下卦分宮，這比後來如《元包》之類好多了。我們參加整理的人都發現，按照帛書的卦序，也可以畫出一種卦位圖，這種圖和宋人所說的先天卦非常類似，只有四隅卦差了九十度。為什

麼？那道理就是因為《說卦》中“天地定位”那幾句話，帛書本與今本略有不同。如果是按照今本的樣子，那就畫出先天卦位來了。這樣就可以看出來，尚秉和及近代那些搞漢易的人，如日本的鈴木由太郎的《漢易研究》，他們指出在漢代已經有先天卦的觀念，我覺得這是正確的。所以後人所謂“河圖洛書”，宋代講易學的那些基本的東西，不可能是宋人發明的。清朝人搞門戶，特點就是好給人戴帽子。當時最大的帽子就是“二氏”，他們考出宋人的卦圖出於陳搏，這個帽子就套上了。陳搏不是老道嗎？陳搏既然是老道，你當然就是背棄了儒家正宗。但是道教難道就不可以保存漢代的一些東西，甚至是先秦的東西嗎？例如今天我們看見的《周易參同契》，裏面保存的東西就是比較早的。漢易本以象數為本，後來王弼一掃象數，就把這些東西忘掉了。儒家的人忘了，但道教把它保存了，反而得到發展，為什麼不可以呢？如果我們不講門戶，這個問題本來是很平實的。

另外馬王堆帛書《五行》，也可以看出很多東西來。宋學的一些基本觀念，過去很多人都認為先秦不會有，但現在在帛書裏面都有。比如“理”呀、“性”呀，帛書裏都講到了。這也沒有什麼奇怪，宋學本來是以思孟之學為本，而《五行》正是思孟一派的作品。從現在發現的新材料出發，再去看傳世各種文獻，宋人所說曾參、子思、孟子的統系確是存在的。《五行》的作者，應該是這一派的後學。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，宋學有些地方是比較接近先秦的。

六 結語：走出“疑古”時代

剛才談到宋學，也就是清人所劃分的漢、宋的問題。其實，今、古的問題也是這樣的。漢代當然有所謂今文經、古文經，問題是當時是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說，今文為一派，古文為一派，兩派水火不相容呢？這是一個很值得重新審查的問題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我前些時候寫的一篇小文，實際上是一條札記，印在張岱年先生主編的《國學叢書》

第一種《國學今論》裏，題目叫做《〈今古學考〉與〈五經異義〉》。《今古學考》是清末今文經學大家廖平先生的名著，對康有為的經學有很大影響。平分今古是廖氏經學初變的宗旨，《今古學考》主要是依據東漢許慎的《五經異義》，把漢學嚴格分為今文、古文兩派。這樣的觀點，已經成了經學史的常識。可是仔細覆按《五經異義》，發現很多地方與《今古學考》不合。許慎本人據《說文·敘》所說，“其稱《易》孟氏、《書》孔氏、《詩》毛氏、《禮》《周官》、《春秋》左氏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皆古文也。”這裏所說的《易》孟氏是孟喜之學，明明是今文，不是古文，可見許慎並不是專學古文的。他的《五經異義》，也是有時尊今文，有時尊古文，並沒有門戶之見。《今古學考》強把“孟氏”改成“費氏”，是沒有理由的。這一類例子說明，在學術史上有許多帶關鍵性的問題，今天是必須重新考慮了。

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，最後讓我簡單地歸結一下。

馮友蘭先生曾講到一個“三階段”說，即“信古——疑古——釋古”。這個說法是不是他第一個提出的，還需要探討。後來有學者認為，不如把“釋古”改成“考古”。考古當然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在前面已經談了不少。這幾天我正在寫一篇紀念郭沫若先生百年誕辰的文章，也特別強調他倡導以考古探索古史的功績。不過，當前大家說“考古”，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，其涵義恐怕不像“釋古”那麼寬廣。我想說的是，咱們今天的學術界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“疑古”的階段脫離出來，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。在現在的條件下，我看走出“疑古”的時代，不但是必要的，而且也是可能的了。

我們要講理論，也要講方法。我們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，這是“疑古”時代所不能做到的。充分運用這樣的方法，將能開拓出古代歷史、文化研究的新局面，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。在座的各位，都對中國文明的許多方面有深入的研究，開拓這種研究新局面的重要性，就用不着我再來多說了。

（李零、魏赤整理）

【李學勤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】